

清末以来（1908—2021）《永乐大典》研究综述

□ 刘 鹏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编修于明永乐初年的《永乐大典》（后文多省称“《大典》”），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，以 22937 卷（含目录 60 卷）、11095 册的规模（估算字数约 3.7 亿字^①），收录了明初以前数千种书籍，成为文献之渊海。书成之后，因卷帙浩繁，未能雕版印行。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，朝廷复重录《大典》，至隆庆元年（1567）藏事，《大典》自此遂分“正副”——永乐原本又称“正本”，嘉靖重录本又称“副本”——为其在后世的不绝如线埋下了伏笔。

然而，虽然副本的出现客观上降低了《大典》失传的风险，但实际上其多舛命运却从此刻开始。先是副本问世后，正本即神秘失踪，其去向、存亡究竟如何，至今仍是《大典》研究中有争议的话题，或者“人类未解之谜 XX 种”一类书中必备的案例。接着是副本在嘉靖以后秘扃深藏，无人问津，在清中叶编修《四库全书》《全唐文》前后短暂受到重视，至晚清以降复迭遭鼠窃兵燹，以至于历经 600 余年沧桑磨洗，举世竟仅存 800 余卷、400 余册，约原书 4% 之篇幅。

因为存世绝少，使同为旷世巨著的《永乐大典》受到的关注远少于《四库全书》^②。但《大典》不可磨灭的文物和文献价值，使得自清末以来，不仅海内外藏书家及文博机构汲汲于《大典》之收藏与保护，文史学者们更是普遍在治学中参考、征引《大典》文献，并从《大典》的编纂与流传研究、《大典》文献的辑佚、《大典》文献对存世文献的校勘与比较研究等三大方面，对《大典》加以研究，留下了不少成果。对百余年来研究成果加以研讨与总结，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与助力，成为必要之举。本文即试图从百年研究概况入手，以三大研究主题为核心，对清末以来（1908—2021）《永乐大典》研究情况加以综述^③，以就正于学界同仁。

一、1908—1948：奠基与发轫

《大典》研究的开山之作，当属缪荃孙发表于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十二月十二日《国

^① 《大典》字数，均系据存卷字数逆推而得，故各家估算数不一。有 3.7 亿（似首见于 1957 年版李光壁《明朝史略》，后人及各类辞典多持此说，但均无测算依据）、4.2 亿（顾力仁）、4.5 亿（虞万里）甚至 8.1 亿（游国恩）多种说法。参李光壁《明朝史略》（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57 年，第 221 页）、虞万里《有关〈永乐大典〉几个问题的辨证》（《史林》2005 年第 6 期，第 21—36 页）、游国恩《永乐大典字数》（《游国恩文史丛谈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6 年，第 292—293 页）。今按《大典》因存卷甚少，每页、每卷、每册字数均不一，线性外推实难得出准确数字，今暂依主流说法。

^② 以“永乐大典”及“四库”为检索词，分别粗检中国知网“篇名”项，前者相关研究论文（含部分报纸报道）为 444 篇，后者为 3041 篇，比例约为 1: 7。

^③ 所见《大典》研究目录或综述类文章有：顾力仁《〈永乐大典〉研究之资料与论文索引并提要》（顾力仁《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》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，1985 年，第 513—628 页），张志清《1994—2002 中国内地学术期刊〈永乐大典〉引文论文篇目索引（以论文发表年代为序）》（《文津流觞》总第 2 期，2002 年），李小文、张志清《〈永乐大典〉研究论文论著分类索引》（同前），代洪波《1979—2012 年国内〈永乐大典〉研究述略》（《山东图书馆学刊》2013 年第 1 期，第 98—105 页）。

粹学报》第12号的《永乐大典考》一文^①。该文据明清史料，简述《大典》自永乐始修至清末庚子之变间成书、重抄、辑佚、散亡之历史。作者亦作为历史见证人，记录了1900年以前其耳闻、亲阅翰林院《大典》藏弃之详情；文中《大典》不同时期册数等记载，更成为后世研究之重要史料。以今日之眼光来看，该文最有价值的部分，正在于此。同题文章又见于清宣统二年（1910）刻民国二年（1913）印本《艺风堂文续集》卷四，与此文框架略同而有所补正（如前文称庚子之变后“《大典》遂一册不存”，后文则修正为“只存三百余册”），且附有所编《大典》为《四库全书》收录365种书之详目。缪荃孙对《大典》的关注，可能促使他于1909年9月就任京师图书馆监督时，即通过学部“请颁《四库全书》、宋元明刻暨《永乐大典》送部交馆储藏”（1909年9月10日《新闻报》），国家图书馆也因此与《大典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自问世之日起，《永乐大典》即秘藏于宫掖左近。其卷帙浩繁，又采用历代类书绝无仅有的“用韵以统字，用字以系事”编纂方式，翻检颇为不便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至斥其为“割裂庞杂，漫无条理”^②。如此情形之下，明清帝王固然绝少“御览”，除了参与编纂《四库全书》《全唐文》等大型官修典籍外，士大夫亦难于接近（缪荃孙《永乐大典考》中即记录其身为翰林院编修，起初却无法阅览藏于该处的《大典》存卷之事），普通读书人更无从问津，极大地限制了《大典》的传播与利用。1912年7月16日，民国教育部将残存《大典》60册拨交京师图书馆（即北平图书馆、北京图书馆及今国家图书馆前身）“整理储藏”^③，虽然与全书相较，不过一鳞片羽，但却开启了《大典》研究的新契机。

从20世纪20年代起，北平图书馆以教育部拨交及陆续收集的《大典》残册、影印本、交换抄本为基础，产生了以袁同礼先生的《大典》卷目系列调查、赵万里先生的《大典》文献辑佚为代表的一系列成果，并于1929年《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》第2卷第3、4号合刊首创“《永乐大典》专号”。《专号》共收录相关文章14篇（并附有前已发表之李正奋《永乐大典考》、李俨《〈永乐大典〉算书》之刊期信息）：孙壮《永乐大典考》摘录自明至民国各类《大典》史料。袁同礼《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》记载至1929年2月世界各地存藏《大典》286册之卷目表，包括卷数、页数、韵目、内容、度藏、杂记诸项。朱绪曾《〈中兴礼书〉〈续中兴礼书〉》、傅增湘《藏园群书校记之〈都城纪胜〉〈双溪醉隐集〉》、孙尔准《无弦琴谱叙》皆为《大典》本之提要或校记。王国维遗作《湖山类稿补遗（附校记）》自《大典》本辑补汪元量佚诗、佚词。引人注意的是，14篇文章中，赵万里先生独占8篇，其内容或排比清人自《大典》辑佚书目（《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》），或考证《大典》所载之戏曲（《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》），或自《大典》辑佚宋金人诗词（《永乐大典内之周美成佚诗》《宋词搜逸（续）》《二金人词辑》《永乐大典内之元人佚词》），或为馆藏《大典》撰写提要（《馆藏永乐大典提要》）。可以看出，这期“专号”实际上的主持者为赵万里先生——8篇专文外，朱绪曾、孙尔准两文均自二人文集选出（可能亦

^① 当代论著一般均著录为“第4卷第12期”，但翻检原书，扉页题“第四年戊申第十二号（第四十九期）”，缪文书口处亦作“第四十九期”，则缪文当发表于《国粹学报》创刊第四年（自1905年计）第十二号、总第四十九期，第8—9页。

^② （清）纪昀总纂：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3504页。

^③ 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：《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（上）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30页。

是赵先生所选），王国维《湖山类稿补遗》后赵先生所作《校记》、题跋及再补遗，篇幅已超过原作。至于袁同礼先生的《大典》卷目调查，为其利用自身广泛的国际业界交游和出国考察之机会访问而得，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，此项工作之完成，非其人不可。

30—40年代，袁同礼、赵万里二先生的主要精力，转移至北平图书馆的馆务与善本采编，故《大典》论文渐少，但更多的学者已致力于此。1930年代，张国淦指导史念海自平馆所藏《大典》中辑录所收方志，成《永乐大典方志辑本》，并附有考证，可惜直至本世纪初方得以整理出版^①。1934年，供职于辽宁奉天图书馆的郝庆柏参考赵万里先生《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》，在馆长金毓黻指导下撰成《永乐大典书目考》四卷，由辽海书社出版。金氏在序言中云“研讨永乐大典之风近时始盛，如袁氏同礼之《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》、赵氏万里之《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》，其最著也”，程千帆（程会昌）先生《清孙冯翼〈四库全书辑永乐大典本书目〉钞本跋》（《图书馆学季刊》1935年第9卷第2期，第152—154页）一文也称“近赵万里又作《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》，所采下逮今人辑书，并著其版刻，最为详备”，可见袁、赵二先生研究之影响。此外，1940年代受邀赴美国国会图书馆鉴定、整理馆藏中文古籍的王重民先生撰有《记国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》（《辽海引年集》，北京和记印书馆，1947年，第57—70页），逐册介绍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40册《大典》及其内容，亦为国内全面了解流散海外之《大典》，提供了重要信息。

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研究还有1938年郭伯恭所著《永乐大典考》。作者鉴于《大典》成书已逾五百年，“然欲求一有系统之说明，尚付阙如也”，遂“既撰《四库全书纂修考》竟，更欲将《大典》纂修始末，一一为之考证，俾便观览”^②。全书十章，除导言、余论外，涉及《大典》之纂定、纂修诸人考略、《大典》之体制、录副、厄运、清乾隆间之《大典》、《大典》之辑佚、《大典》之散亡诸方面，末附《大典》内辑出佚书一览表。全书结构完整，讨论亦较前人为深入，可以说覆盖了后世研究的各个主题。书中除据史料考出预《大典》修纂之役者194人外，还首次考定永乐正本毁于明末清初李自成离京前火焚紫禁城之时^③。

自清末至民国，《大典》残卷除北平图书馆所有106册外^④，稍稍见于市廛，流失海外者亦复不少，并有部分卷次获影印、排印出版。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傅增湘、张元济、董康、叶恭绰、梁启超、刘承幹、徐世昌、鲁迅、郑振铎、胡适等人，或收藏，或保护，或贩卖，或研究，都与《大典》结缘^⑤。在收藏存卷最多的北平图书馆推动下，《大典》

^① 1950年代，张氏又依据新入藏北图之《大典》辑成《永乐大典方志辑本补》。后《辑本》及《辑本补》稿本于1976年由家属捐赠上海图书馆，并于2009年经杜和春标点整理，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。其序言及整理说明，对张氏自平馆借阅、抄录《大典》之历史有详细描述。

^② 郭伯恭：《永乐大典考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8年，第1页。

^③ 周次辛《获园随笔·永乐大典》（《益世报》1929年1月21日）亦云《大典》藏于“宫内一部，闻遭李闯之乱而毁”，然该则笔记错误不少，此说亦得诸传闻而已。

^④ 此系笔者据赵爱学《国图藏嘉靖本〈永乐大典〉来源考》（《文献》2014年第3期，第37—64页）一文统计。

^⑤ 谢冬荣：《傅增湘与〈永乐大典〉》，《四川图书馆学报》2007年第1期，第67—70页。柳和城：《张元济与〈永乐大典〉》，《书里书外 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》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306—314页。张升：《董康与〈永乐大典〉的流传》，《历史文献研究》2018年第1期，第356—365页；《梁启超、叶恭绰与〈永乐大典〉的收藏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2年第2期，第154—159页；《再

研究渐次展开。在这一发轫期中,《大典》的编纂与流传研究、《大典》文献的辑佚这两个领域成果相对较多,而《大典》文献对存世文献的校勘与比较研究虽相对较少,却颇有价值。如郑振铎《〈西游记〉的演化》(《文学》1933年第1卷第4号)讨论吴承恩本《西游记》系“创作”抑“改作”,除取明代诸版本比较外,复抄录《大典》卷13139“送”字韵“梦”字册“魏徵梦斩泾河龙”条全文,称其为元人所作“古本《西游记》”。并认为《大典》本《西游记》为吴本之祖本,并经吴承恩以“更伟大、更光荣的改造”^①。杨志玖《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》(《文史杂志》1941年第1卷第12期,第47—52页)论证《大典》卷19418“勘”字韵中收录元代《经世大典·站赤》中所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(1290)公文,可与《马可波罗游记》相互印证,证明马可波罗确曾游历中国,并推测其离华时间。二文均成为相关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成果,影响持续至今。

这一时期,已有部分域外学者从事《大典》研究,尤其是《大典》最初的主要流入国英国和素有汉学传统的日本。1920年,英国汉学家、英国国家博物馆东方图书部翟林奈(Lionel Giles)发表《〈永乐大典〉笔记》(A NOTE ON THE YUNG LO TA TIEN),逐册介绍其在英国所见26册《大典》之卷次、收藏者、来源、内容、页数、保存状况等^②。日本学者则致力于补正袁同礼先生的《大典》卷目表,如今崛诚二《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追补》、岩井大慧《袁氏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补正》等^③。

二、1949—1977: 发展与沉寂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《大典》进一步向公藏单位集中。外交政策上,新中国与苏联、东欧国家结成社会主义阵营,因此,从1951年至1958年,苏联列宁格勒大学、东德莱比锡大学、苏联列宁图书馆、苏联科学院分别向我国归还《大典》共计67册。1950年至1965年,国内商务印书馆董事会、北京富晋书社、广州市文化局(郑广权)、北京大学、广东省博物馆(钟毅弘)、周叔弢、顾子刚、徐伯郊、金息侯、赵元方、张季芴、陈李霭如、赵万里等机构和人士也陆续捐赠《大典》36册^④。加上其他途径购入,北京图书

谈嘉业堂藏《永乐大典》的下落》,《图书馆研究与工作》2005年第3期,第78—79页。王若:《关于嘉业堂所藏《永乐大典》的下落》,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》2002年第6期,第17—19页。崔石岗:《鲁迅、郑振铎与《永乐大典》》,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》2001年第3期,第65—66页。胡适则对《大典》避讳(《〈永乐大典〉避讳“棣”字》,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,黄山书社,1994年,第274页)、《目录》(《记〈永乐大典目录〉六十卷》,1958年2月9日手稿)尤其是《大典》本《水经注》有所研究。

^① 笔者所据为《郑振铎文集》第五卷所收《〈西游记〉的演化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5年,第244—275页)。

^② Lionel Giles, *A Note on Yung Lo Ta Tien, The New China Review* (1920), Vol.2, Issue 2.此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影印该报,第157—173页。此外,1920年12月17日《益世报》登载《外人论中国之〈四库全书〉》一文,引用“密勒评论报”(或即指《密勒氏评论报》——Millard's Review)之说,认为永乐帝编纂《大典》之因,在于其迁都北京之议“因人民反对,乃锐意于文事,创制一关于历代典章制度之巨书,名曰永乐大典,共二万三千卷,藉以消弭人民之反对”。今按永乐帝迁都北京,从动议到正式北迁,历时甚久,且集中在永乐中后期,而《大典》于永乐五年即已定稿,此说聊备一解而已。

^③ 今崛诚二:《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追补》,《史学研究》1940年12卷3号。岩井大慧:《袁氏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补正》,《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》,东京座右宝刊行会,1940年。以上据张升《永乐大典研究资料辑刊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5年,第1022页。

^④ 此系笔者据赵爱学《国图藏嘉靖本〈永乐大典〉来源考》一文统计。

馆所藏《大典》已达 222 册（包含时存美国、现存台北故宫的 62 册），包含了今日 224 册馆藏的绝大部分。

1950 年代《大典》研究基本集中在梳理简史与排比馆藏的层面。代表作有郑振铎《关于永乐大典》（1951 年 8 月 31 日《人民日报》）、赵万里《永乐大典展览的意义——一九五一年八月北京图书馆举办》（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1 年第 9 期，第 221—233 页）、《〈永乐大典〉本〈水经注〉破镜重圆记》（1958 年 12 月 5 日《人民日报》）等。此外，台湾昌彼得与北京王子霖分别撰有长篇介绍文章《永乐大典述略》（《大陆杂志》1953 年第 7 期，第 18—20 页）、《〈永乐大典〉辑考》（1959 年 9 月）^①，但前者不为大陆学界所知，后者则生前并未发表。昌文推究明成祖以历来较少采用之以韵分类法编纂《大典》，是因其“好观韵府杂书”，所谓“韵府”，即元阴时夫以一百零六韵所编类书《韵府群玉》。其说虽本于四库馆臣^②，且误以解缙洪武时上书为永乐时事，但用以解释《大典》之编例，则颇有启发性。

1960 年，中华书局以北图藏本为主体，影印《大典》730 卷，分装 20 函，202 册，极大地促进了《大典》的传播与研究。郭沫若撰写的序言，除介绍《大典》编纂、散佚、回归情形外，也提出《大典》正本可能毁于明亡之际文渊阁大火，因作者的重要身份与影印本流传较广，使郭沫若成为“正本亡于明末清初战火”说之代表人物。影印本出版后，胡道静、王仲荦都写有长篇读后札、校记^③，或以《大典》校勘史籍，或拈出稀见史料加以介绍。此外，胡文论及文廷式曾抄录《大典》千余纸，王文举例分析《大典》征引、句读之误，均为前人所未及。1962 年，台湾世界书局以中华本为基础，增补台湾及德国所藏，影印出版，共收入《大典》742 卷，并附有《永乐大典辑略》等相关书目、论著 123 卷，可谓相得益彰，但其内容似较少为大陆学者关注。

1966 年以前较为重要的一篇论文是王重民《〈永乐大典〉纂修人考》（《文史》1965 年第 4 辑，第 171—212 页）。该文据《大典》史料尤其是明代别集、方志，考出大典监修、副监修、都总裁、总裁、副总裁、纂修、誊录及圈点生等 264 人，较郭伯恭原考有较大增补，《大典》纂修与重录人员研究，之后也发展成为《大典》编纂与流传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。另有《〈永乐大典〉的编纂及其价值》（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0 年第 2 期，第 336—342 页）一文，综述《大典》纂修的时代背景、过程、价值以及馆臣辑佚的不足等，惜生前未及发表。此外，刘盼遂先后发表《〈永乐大典〉正本运存南京的问题》（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社科版 1961 年第 4 期，第 37 页）、《“永乐大典”漫谈》（1961 年 5 月 14 日《光明日报》），考证在明隆庆时代并无《大典》“正本运存南京”之事，并引起了一场小的讨论^④。

^① 王雨著、王书燕编纂：《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》第 3 册《日记、信札及其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3—13 页。

^②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（第 3465 页）述《韵府群玉》云：“明成祖颇喜其书，故解缙大庖西封事称陛下好看《韵府杂书》，抄辑稂莠，略无文彩。”

^③ 胡道静：《读影印本“永乐大典”记》，《图书馆》1961 年第 4 期，第 51—54 页。王仲荦：《渤海一勺——读影印本永乐大典存卷后记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 4 辑，1963 年，第 305—328 页。

^④ 稍后，《光明日报》先后发表陈鼎卿《关于“永乐大典”的“谜”——读刘盼遂先生文后提供一个线索》（1961 年 5 月 25 日）、武静寰《永乐大典正本运回南京有无其事》（1962 年 3 月 10 日）二文。

《大典》辑佚方面，有胡道静辑《种艺必用》及其《补遗》（农业出版社，1963年），赵万里先生辑《薛仁贵征辽事略》（古典文学出版社，1957年）、《元一统志》（中华书局，1966年）。1963—1966年，琴学名家汪孟舒自《大典》中辑录乐谱与涉及音乐之史料，成《选录永乐大典音乐稿》十二函。惜历劫有阙，久未面世，近年始以“《永乐大典》音乐史料辑录（九卷）”为名，收入《古吴汪孟舒先生琴学遗著》（中华书局，2013年，第605—797页）。

1966年至1976年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大陆学界对《大典》的研究被迫中断，陷入沉寂。台湾及日本学界则仍有部分值得关注的成果。1967年，于大成发表《永乐大典与大典学》（1967年7月台北《大华晚报读书人周刊》），首次提出以《大典》存卷为基础，建立一门“大典学”。苏振申《永乐大典年表初稿》（《东西文化》第1卷第5期，1967年，第42—53页）及《永乐大典年表（修订稿）》（《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馆刊》新8卷第1期，1975年，第29—44页）采编年体，辑录自明太祖诏修类书至当时有关《大典》编修及历代研究之史事^①。日人太田辰夫《〈永乐大典〉本〈西游记〉考》则讨论《大典》所载古本《西游记》“梦斩泾河龙”故事，考订其为明初作品（《神户外大论丛》第20卷第3、4号，1969年）^②。

三、1977—2021：复兴与深化

1978年以后，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，《永乐大典》的研究也进入了复兴与深化阶段，成果在数量上固远非之前可比，深度与广度上也有不少突破。这一阶段约略可分为两个时期，前一时期恢复对《大典》的全面研究，后一时期则进一步深化。两个时期以2002年4月国家图书馆召开的有80余位中、美、英、法、日、韩学者参加的“《永乐大典》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”为分界标志。这次研讨会发表的30余篇论文^③以及同时国图内部刊物《文津流觞》刊发的“《永乐大典》专辑”是《大典》研究史上最集中的一次成果展示，会议及论文中讨论的《大典》海外存藏情况研究、原大仿真出版^④、辑佚、修复与保护、数字化等主题，既是对此前研究的呼应与总结，也成为此后研究与保护工作的重点。

因这一阶段成果较多，故本节以三大研究主题为核心，各主题内重要成果仍以发表时间为序，分别加以评述。

^① 苏振申尚有《天理访永乐大典记》（《“中央”日报》航空版1967年8月4日）、《日本访永乐大典记》（《中国一周》1969年第1000期，第11—12页）、《永乐大典之纂修》（《天声杂志》创刊号，1971年，第51—56页）、《永乐大典聚散考》（《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馆刊》新4卷第2期，1971年，第10—22页）、《永乐大典录副考》（《天声杂志》第1卷第3期，1971年，第36—42页）等系列文章。

^② 此据日本太田辰夫著，王言译《西游记研究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161—172页。

^③ 结集为国家图书馆编《〈永乐大典〉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3年）。下文省称“《论文集》”。

^④ 这次会议上，任继愈馆长发表了“致《永乐大典》收藏单位呼吁书”，呼吁“世界各地藏书机构、收藏家群策群力，共襄盛举，拿出《永乐大典》原书，提供拍照、再版之用，使这一文化遗产重现于世，垂之永久”。以此次会议为契机，国图出版社自2003年至今以原大仿真的形式陆续影印了海内外200余册《大典》存卷。此外，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《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》，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利用。

（一）《大典》的编纂与流传研究

《大典》的编纂与流传研究，与《大典》辑佚侧重补充它书之阙、《大典》校勘侧重订正它书之讹不同，是以《大典》作为主角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“真正的以《大典》为中心”的研究，也可以说是《大典》研究的根本。

这一领域中，学界的代表人物有张忱石和张升。张忱石上世纪70年代起在中华书局从事新发现《大典》存卷的调查与影印工作，此后除发表《〈永乐大典〉漫话》（《读书》1979年第3期，第78—86页）、《〈永乐大典〉续印本（六十七卷）史料价值发微》（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6年第3辑，第247—278页）、《现存〈永乐大典〉所见方志史料价值发微》（《论文集》，第1—22页）等论文外，还首次提出《大典》正本“殉葬嘉靖帝永陵”之说^①。所著《永乐大典史话》全面介绍《大典》成书、重录、散佚、收集、价值、辑佚、卷目等内容^②，翔实平易，更成为文史领域众多后辈了解并对《大典》发生兴趣的津梁。张升则自2001年发表《〈永乐大典〉与大典本〈永乐志〉》（《历史文献研究》总第20辑，第152—166页）起，长期从事《大典》研究，先后编著《永乐大典研究资料辑刊》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5年）、《〈永乐大典〉流传与辑佚研究》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）、《〈永乐大典〉流传与辑佚新考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9年）等专著三部，发表涉及《大典》目录^③、缺卷数、正本去向、副本流传、余纸^④、乾隆御题诗^⑤、方志、全书复原及四库馆《大典》辑佚等论文多篇，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有开拓，发覆良多。

台湾学者顾力仁所著《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》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，1985年）为迄今探讨《大典》纂修、体制、内容、录副、沿革、利用、辑佚、贡献及还原等问题时研究主题、层次最为细密之著作。其特色为众多表格与索引的编制，如第四章《〈永乐大典〉之录副及其沿革》即编制了“重录《永乐大典》馆组织表”“《永乐大典》录副人索引”“《永乐大典》储地变易表”“《永乐大典》刊印简表”等，其他章节亦差相仿佛。此书虽在讨论深度上仍可推进，但其各章节所提出之问题，开阔了学界进一步研究的思路。

此外，郝艳华《〈永乐大典〉史论——六百年来的流传、整理与研究》（中国古文献出版社，2009年）对《大典》的编纂、流传、整理与研究做了全面梳理，提议建立《永乐大典》研究中心和“大典学”，并从对《大典》的整理与研究，对《大典》整理研究成果的再研究，对《大典》研究史和“大典学”研究方法的总结三方面加以研究。

单篇论文方面，虞万里《有关〈永乐大典〉几个问题的辨证》（《史林》2005年第6

^① 张忱石：《〈永乐大典〉正本之谜》，《书品》1986年第2期，第41—44页。

^② 张忱石：《永乐大典史话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。另有修订本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4年）。

^③ 《抄本〈永乐大典目录〉的文献价值》（《历史文献研究》2014年第1期，第228—236页）指出国图藏清姚元之抄本《永乐大典目录》可补连筠篔丛书本《目录》之误，并独有《永乐大典韵总歌括》及《韵总》，具有很高文献价值，并可据以整理成更为完整之《永乐大典目录》。

^④ 《〈永乐大典〉余纸考》（《史林》2010年第2期，第112—117页）探讨《大典》“余纸”的定义、截取、用途，并指出余纸为鉴定《大典》副本之重要依据。

^⑤ 《〈永乐大典〉乾隆御题诗考》（《文献》2011年第4期，第162—169页）考证《大典》乾隆御题诗之由来与现存情况。指出乾隆为《大典》辑佚本题诗31首，其中13首重装入《大典》，诗意肯定之辑本收入《四库》，诗意批评者入存目或存目亦不入。

期,第21—36页)就《大典》编纂动机、卷册字数、纂修人数与《洪武正韵》关系等问题加以探讨;黄权才《〈永乐大典〉若干问题新论析》(上)(下)(《图书馆界》2007年第2、3期,第43—47页、第51—54页)则就《大典》编纂目的、《大典》前身《文献大成》之编纂、《大典》总纂陈济之功绩、解缙之作用、《大典》之分工、《大典》成书时间等问题提出见解。二文对《大典》编纂之细节讨论较为深入,虽然有些问题因史料所限,不易得出确定结论,但讨论本身仍颇有启发性。杜泽逊《〈四库〉底本与〈永乐大典〉遭焚探秘》(2003年2月26日《中华读书报》)则考证《四库全书》底本与《大典》存卷毁于1900年庚子事变中的翰林院,但纵火者系义和团而非使馆人员或八国联军,澄清了当时的广泛误解^①。张涛对清前期“三礼馆”辑录《大典》经说的发现与考察^②,证明四库馆辑录《大典》时未参考三礼馆辑佚之经验。项旋《〈永乐大典〉副本署名页之价值考论》(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4年第2期,第91—105页)全面整理218册《大典》署名页所载录副人员相关信息,考察《大典》录副人员的动态流动,认为署名页所揭示录副人员更替、衔名变化,可藉以探究《大典》录副具体分工与进度。卢雪燕《吉光片羽——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〈永乐大典〉》(《光明日报》2016年2月26日)介绍国立北平图书馆运美迁台暂存台北故宫的62册《大典》及其入藏经过,较为翔实。翁敏修《〈永乐大典〉纂修人新考》(《兴大中文学报》第四十一期,2017年,第63—96页)在前人基础上,新考得《大典》纂修人58人(编纂30人、誊录28人)。还发现各类文献对《大典》纂修工作的记录方式,纂修者一般记录为“预(与)修”“徵修”“纂修”,而誊录圈点者则记录为“书”“写”“缮写”。郭亚凯《明代官方抄本书法艺术研究——以〈永乐大典〉为例》(中央美术学院2017年度硕士学位论文)试图从《大典》书法特点(如均匀雅致、风格统一、晋唐之风,工作量固定,抄写规格统一等)的角度进行深入讨论,然选题甚佳而所得未多,是所惜者。高树伟《一段被遗忘的〈永乐大典〉度藏史》(2017年8月19日《澎湃新闻》)据清人张能麟《西山集》两则《大典》新史料讨论皇史宬与《大典》之关系;其与张鸿鸣合撰《罗振玉藏〈永乐大典〉残帙辨伪》(《历史文献研究》2020年第2期,第226—233页)一文提出鉴定嘉靖副本三要点,对于《大典》鉴定亦有参考价值。丁治民、汪亮娟《〈永乐大典韵总〉〈永乐大典目录〉二者关系考——兼论〈永乐大典〉“用韵以统字”的“字”数》(《阅江学刊》2018年第6期,第63—74页)考证《大典目录》是在《韵总》基础上删减、增加和改正韵字而成,可视为《韵总》的增修本;《大典》“用韵以统字”之“字”数为50193;另有《宇内孤本〈永乐大典韵总歌括〉名实关系考论》(《辞书研究》2019年第5期)逐韵、逐纽比较《韵总歌括》《韵总》《目录》之异同,认为《韵总歌括》与八十韵本《洪武正韵》纽数相同,而较《韵总》纽数为少,不能完全概括《韵总》实情,所谓“歌括”名不副实。刘怡飞《莫理循旧藏〈永乐大典〉卷册及流散考》(《汉语言文学研究》2019年第3期,第112—132页)根据《泰晤士报》记者莫理循遗留“莫理循文件”等原始资料,对其旧藏《大典》册数、具体卷次、现藏地

^① 张升《〈永乐大典〉遭劫难的真相》(《河北学刊》2004年第4期,第201—205页)考证1900年庚子事变中翰林院所存《大典》焚毁、丢失、归还、复遭流散之史实,可与此文对读。

^② 张涛:《三礼馆辑录〈永乐大典〉经说考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11年第6期,第98—130页;《三礼馆〈永乐大典〉辑录稿的发现、定名及其来历》,《文津学志》总第4辑,2011年,第87—95页;《也谈〈永乐大典〉礼学文献残阙事》,《中国哲学史》2016年第4期,第117—120页。

和流散经过进行全面论述,考证颇详,提醒我们应对外文史料做进一步挖掘。文中还对《大典》之英文译名做了系统梳理,也颇富价值。林鹤《〈永乐大典〉编纂流程琐议——以〈宋会要辑稿〉礼类群祀、大礼五使二门为中心》(《文史》2020年第1辑,第279—288页)根据《大典》对《宋会要》甲、乙合订本之不同采摭,判断其工作流程是先确定事目,再分配专人从专书中摘抄相应材料。但摘抄内容选择与编辑,似未制定严格体例,而是由编修官临事自主裁定。而在《大典》后期编纂阶段,似亦无人负责统稿,对前期工作作出修正。郑云艳《民国以来〈永乐大典〉海内外流通价格变迁考》(《文献》2020年第4期,第165—189页)则依据翔实史料,探讨了民国以来《大典》的流通价格及其影响因素。

而作为海内外首屈一指的《大典》收藏机构,国家图书馆及其《文献》《文津学志》《文津流觞》、《古籍保护研究》(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、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承办)等刊物承继了袁同礼、赵万里及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等前辈奠定的传统,始终不懈地致力于推动《大典》的寻访、保存及研究。张志清、陈红彦、谢冬荣等古籍馆执事,以及李致忠、陈杏珍、杜伟生、张平、朱振彬、赵前、周崇润、李小文、林世田、汪桂海、李红英、史睿、董蕊、李文洁、杨印民、赵大莹、刘波、赵爱学、许海燕、胡泊、谢德智等老、中、青年研究人员群体,先后从修纂、重录、递藏、影印、修复及研究现状等不同角度对《大典》加以研究,也涌现出一批成果^①。其中陈红彦“《永乐大典》六百

^① 相关论文有:张志清:《赵万里与〈永乐大典〉》,《中国文物报》2002年5月10日,又见于《论文集》第158—177页;《赵万里主持〈永乐大典〉辑佚成果简目》,《赵万里文集》卷三,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2年,第573—581页。陈红彦:《国家图书馆藏〈永乐大典〉述略》,《论文集》,第256—263页;《国家图书馆〈永乐大典〉收藏史话》,《文津流觞》总第2期,2002年;《〈永乐大典〉六百年》,《光明日报》2009年9月17日(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同名讲座DVD)。林世田:《〈永乐大典〉中佛教文献初探》,《论文集》,第61—103页;《〈永乐大典〉本〈禅林类聚〉校录》,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,2003年。谢冬荣:《傅增湘与〈永乐大典〉》,《四川图书馆学报》2007年第1期,第67—70页。李致忠:《略谈〈永乐大典〉》,《国家图书馆学刊》1983年第2期,第34—37页。陈杏珍:《北图藏明内府写本〈永乐大典〉述略》,《北京图书馆馆刊》1998年第4期,第124—126页。杜伟生:《〈永乐大典〉修复始末》,《国家图书馆学刊》2004年第2期,第64—68页。张平:《〈永乐大典〉修复与保存方法分析》,《论文集》,第365—370页;《关于改进〈永乐大典〉装具的设想》,《古籍保护新探索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294—296页。朱振彬:《我在国图修典籍——〈永乐大典〉修复记》,《文津流觞》总第66期,2019年。赵前: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影印本〈永乐大典〉概况》,《论文集》,第352—358页;《〈永乐大典〉影印编年简史》,《古籍保护研究》总第5辑,2020年,第158—165页。周崇润:《环境污染与〈永乐大典〉的永久性保护》,《古籍保护新探索》,第297—299页。李红英、汪桂海:《〈永乐大典〉录副诸人考略》,《文献》2008年第3期,第107—117页。史睿:《〈四库全书〉中〈永乐大典〉辑本目录(含存目)》,《文津流觞》总第2期,2002年。董蕊:《〈永乐大典〉收藏史话》,《中国文化报》2009年5月24日。李文洁:《〈永乐大典〉卷2272至2274“模”字韵“湖”字一册》,《光明日报》2013年4月2日。杨印民:《〈永乐大典〉的聚散离合》,《人民政协报》2018年11月1日。赵大莹:《〈永乐大典〉与英格利斯夫妇》,《文津学志》总第8辑,2015年,第133—150页。刘波:《〈永乐大典〉纂修人续考——以方志资料为中心》,《版本目录学研究》总第9辑,2018年,第23—46页;《嘉靖重录〈永乐大典〉参预人员补证》,《版本目录学研究》总第11辑,2020年,第3—10页;《清人自〈永乐大典〉勾辑古佚方志考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20年第4期,第102—111页。赵爱学:《国图藏嘉靖本〈永乐大典〉来源考》,《文献》2014年第3期,第37—64页;《国家图书馆藏〈永乐大典〉的旧藏印和旧藏家》,《古籍保护研究》总第4辑,2019年,第55—64页。许海燕:《化身千百 垂之永久——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仿真影印〈永乐大典〉综述》,《古籍保护研究》总第7辑,2021年,第141—150页。胡泊:《〈永乐大典〉修复工程略说》,《古籍保护研究》总第5辑,2020年,第145—151页。谢德智:《国家图书

年”“说不完的《永乐大典》”“《永乐大典》的前世今生”系列讲座在向公众全面普及、传播《大典》方面影响较大；李红英、汪桂海、刘波、赵爱学的数篇论文在考证《大典》纂修、重录及递藏方面用力颇深；杜伟生、朱振彬等所撰《大典》修复类文章实践性极强，是新的研究类型。但在《大典》辑佚、校勘、比较研究等重要领域，国图同仁尚待进一步有所作为。

海外相关论著，集中体现在《〈永乐大典〉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中。如何大伟（David Helliwell）《英国图书馆所藏〈永乐大典〉》（第264—306页）^①、田仲一成《日本东洋文库收集〈永乐大典〉残本的过程》（第307—315页）、尾崎康《日本对〈永乐大典〉的收藏、保护、研究情况》（第316—323页）、相岛宏《国立国会图书馆藏〈永乐大典〉的保存和利用以及日本的研究情况》（第324—329页）、马泰来《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〈永乐大典〉题记》（第330—332页）、Thomas H.Hahn《五册的变奏曲——康奈尔大学图书馆〈永乐大典〉统计趣闻》（第333—342页）、李惠银《〈永乐大典〉和中文藏书介绍》（第343—351页）等海外学者的论文，为研究海外《大典》的递藏和保存情况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线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00年9月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善本书联合目录编辑部主任艾思仁博士（Dr. Soren Edgren）在八国联军侵华一百周年之际以个人名义呼吁：“值此令人不快的周年纪念日，我希望以个人的名义建议所有目前掌握着这些失散卷册（今按指海外《大典》残卷）命运的保管机构与个人，都能严肃地考虑将其所藏自愿归还给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。”^②据《论文集》所收艾氏《翰林院和英国使馆——〈永乐大典〉随笔》（第251—255页）一文，该信得到的反馈是“90%个人支持和所有收藏机构反对的结果”。反馈上的巨大差异，体现了《大典》原本（包括所有中国外流文物）回归故土所面临的现实阻力。

因为嘉靖重录本《大典》十不存一，人们对从未露面的“正本”，在遗憾和好奇交织中寄予了很大希望。除了较早提出的“毁于明万历宫中大火”“毁于明亡北京战火”“毁于清嘉庆宫中大火”等“毁灭”说外，又增添了“藏于皇史宬夹墙”（据张忱石转述王仲荦观点）、“殉葬嘉靖帝永陵”（张忱石首倡，栾贵明申说）两种“存在”说，并成为这一时期学界乃至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。先是《北京政协》1996年第6、9二期分别刊登白化文《探查〈永乐大典〉正本的倡议》（第39页）、刘烜《赞成探查〈永乐大典〉》（第40页）二文，建议用现代化设备对皇史宬厚墙进行无损探测，确定正本是否在其中。随后《寻根》1999年第4期分别刊登栾贵明《〈永乐大典〉之谜——关于〈永乐大典〉正本殉葬的推想》一文及王春瑜、罗哲文、葛剑雄、陈尚君等学者的质疑、支持或期待（第31—38页），一度也激发了科学界利用技术手段探测永陵地宫的热情^③。时至今日，以上两种

馆藏《永乐大典》述略》，《古籍保护研究》总第5辑，2020年，第152—157页。

^① 在此文基础上，何氏又增补史料，撰成《欧洲图书馆所藏〈永乐大典〉综述》（《文献》2016年第3期，第31—50页），详细介绍欧洲所藏《大典》59册之递藏源流及卷册详情，许多史料系英、德文，弥足珍贵，并附“欧洲所藏《永乐大典》卷目表”。

^② 由睦骏翻译的该信中文版，以“一封有关永乐大典的公开信”为题发表在《图书馆杂志》2001年第4期第55—56页。

^③ 布谷：《〈永乐大典〉魂归何处》，《中国艺术报》，2001年3月2日。

说法仍停留在猜想阶段，但对乐观者而言，这总是一点微弱的希望^①。

此外，众多对《大典》、对编纂者之一解缙加以一般介绍的文章、摘要、故事亦复不少，虽谈不上学术深度，也不乏错误，但毕竟在社会层面维持了《大典》的热度，也向大众普及了《大典》的相关知识，总算瑕不掩瑜。

（二）《大典》文献的辑佚研究

直至今日，仍有学者继踵馆臣，对《大典》的编纂方式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^②，或对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提出质疑^③。但与《四库全书》类似，无论当初编纂时动机如何、编纂过程遗憾多少，几百年后，其文献价值终究无法磨灭。本时期，学界延续了清代以来对《大典》的辑佚，既有对过往辑佚成果的补正与研究，对新发现（或公布）存卷的新辑，更开始从学科角度梳理《大典》中的分类资料。

当代大典辑佚领域成就最著的学者是栾贵明。上世纪80年代初即发表有《大典》诗文辑佚系列^④，随后出版的《四库辑本别集拾遗》（中华书局，1983年）则更为全面，补四库馆臣所辑“大典本”及各家补辑本之遗1864条，占《大典》引录历代别集6496条总数之28.8%，成绩之外，亦可见馆臣辑佚之疏漏。同时完成的《永乐大典索引》（作家出版社，1997年）在《大典》尚未实现全文数字化检索之时，为学界利用存卷提供了极大方便^⑤。另外，如前所述，正是栾贵明重申的“陪葬永陵说”，引发了学界乃至文化界对《大典》正本去向的讨论热潮。

此外，大部头的总集类著作《全宋诗》《全唐诗补编》等均据《大典》辑补佚诗。二十四史之一的《旧五代史》本自《大典》辑出，但存在遗漏、误改等问题。张凡《〈旧五代史〉辑补——辑自〈永乐大典〉》（《历史研究》1983年第4期，第112—120页）、陈尚君《〈永乐大典〉残卷校〈旧五代史〉札记》（《书品》1994年第3期，第20—24

^① 不过，张升在《关于〈永乐大典〉正本下落之谜》（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（社科版）》2010年第2期，第132—135页）一文中，据明末张岱《琅嬛文集》卷一“诗韵确序”及《陶庵梦忆》卷六“韵山”条胡敬辰曾自禁中携出《大典》支韵二十余册之记载，认为其携出之《大典》系为人自禁中盗出之正本，时已在明末清初，间接否定嘉靖帝身后《大典》殉葬之说。邢慧玲《胡氏家藏系〈永乐大典〉正本考辨》（《中国矿业大学学报》2016年第4期，第78—83页）做了进一步申说。

^② 如黄永年即认为《大典》“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，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”（《古文献学讲义》，中西书局，2014年，第117页），辛德勇则认为“实际上《永乐大典》却不三不四，什么都不是，做什么书用也都很不合用，是一件大而不当的废物。就一部书籍的著述形式而言，可谓愚蠢至极，荒唐至极。……在中国古代，大概只有像朱家出生的这些先天神智欠佳的君主，才会做出如此乖张的举止”（《仿真新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〈永乐大典〉二支儿字史料价值略述》，《古文献整理与研究》总第1辑，2015年，第142—159页）。

^③ 如求实《从流通角度看〈永乐大典〉的作用》（《史学月刊》1997年第4期，第118—120页）即认为《大典》存在成书时“删述去取”，成书后利用较少，现有存卷过少且古音韵难懂、利用率很低之缺点，对中国文化未产生大影响。

^④ 如《陈亮、陆游集拾遗——〈永乐大典〉诗文辑佚之一》（《文学评论》1981年第1期，第45—48页）、《杨万里、尤袤集拾遗——〈永乐大典〉诗文辑佚之二》（《文学评论》1981年第2期，第142—144页）、《苏轼、苏辙集拾遗——〈永乐大典〉诗文辑佚之三》（《文学评论》1981年第5期，第123—126页）等，相关内容又以《宋代别集拾遗六种——〈永乐大典〉诗文辑佚》为名收入《古代文学研究集》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，1985年，第391—416页）。

^⑤ 据作者1997年2月自序，《索引》稿完成于“十五年前”。

页)则或予补充,或予指正。还有孔凡礼、费君清、金程宇、方健、郝艳华、洪涛、张健、汤华泉、卞东波、李懿、赵龙、陈鸿图、周方高、宋惠聪对《大典》宋代文献^①,薛瑞兆、李军对金、元文献^②,赵维国、范子焯、袁世硕对《大典》小说、平话佚文的辑考^③。可以说,在整理前代文献时,注意从《大典》中搜集佚文,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常识,在此不一一介绍。

《大典》征引方志甚夥,前人虽有辑佚,但遗珠尚多。马蓉、陈抗、钟文、栾贵明、张忱石等编校的《永乐大典方志辑佚》按今日行政区域,对《大典》存卷所收方志进行辑佚,共收总志7种,方志893种。其中宋元方志170余种,大大超出现存宋元方志数。所收内容涉及“唐宋时期的科举教育制度史料”“农田水利史料”“仓廩史料”“地震史料”“矿产资源史料”“动植物资源史料”“封建大家族史料”“民俗史料”“古籍版刻史料”“补正清人方志辑本之遗缺”“名胜文物及石刻史料”“文学艺术史料”等方面,成为《大典》方志辑佚这一传统课题的集大成之作。此外,陈香白《潮州三阳图志辑稿》《潮州三阳志辑稿》(中山大学出版社,1989年)、《永乐潮州图经志辑稿》(中山大学出版社,1993年),蒲霞的《大典》方志系列研究^④,崔伟《〈永乐大典〉本江苏佚志研究》(花

^① 孔凡礼:《见于〈永乐大典〉的若干宋集考》《续考》《三考》《四考》(以上分别见于《文史》总第18辑,1983年,第189—202页;总第26辑,1986年,第303—320页;总第56、57辑,2001年,第179—192页、第217—228页;总第61辑,2002年,第120—139页);《见于〈永乐大典〉的六十一种宋集考》,《国学研究》总第8卷,2001年,第87—142页。费君清:《〈永乐大典〉中发现的江湖集资料论析》,《杭州大学学报(哲社版)》1988年第1期,第50—58页;《〈永乐大典〉中南宋诗人姓名考异九则》,《文献》1988年第4期,第281—284页;《〈永乐大典〉江湖诗补辑》,《温州师范学院学报(哲社版)》1989年第4期,第45—52页。金程宇:《新发现〈永乐大典〉残卷中的曾巩佚文》,《学术月刊》2004年第9期,第82—88页;《新发现的〈永乐大典〉残卷初探》,《文献》2005年第2期,第157—170页。方健:《久佚海外〈永乐大典〉中的宋代文献考释》,《暨南史学》总第21辑,2004年,第155—190页。郝艳华、洪涛:《新辑〈永乐大典〉所载〈诗话总龟〉佚文》,《文献》2005年第4期,第280—283页。张健:《从新发现〈永乐大典〉本看〈诗话总龟〉的版本及增补问题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社版)》2006年第5期,第96—102页。汤华泉:《〈诗话总龟〉新见宋佚诗辑录——补〈全宋诗〉》(上、下),《古籍研究》2006年第2期、2007年第1期,第157—172页、第2—23页;《谈〈永乐大典〉中宋佚诗的辑录》,《光明日报》2007年3月31日。卞东波:《〈永乐大典〉残卷所载诗选〈诗海绘章〉考释》,《中国韵文学刊》2007年第2期,第103—108页;《〈永乐大典〉所载宋诗话丛考》,《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》,中华书局,2013年,第122—138页。李懿:《中华本〈永乐大典〉陈瓘诗文辑考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12年第3期,第68—74页。赵龙:《四库馆臣辑佚宋人笔记的成就——以辑佚〈永乐大典〉所载宋人笔记为例》,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》2012年第9期,第45—48页。陈鸿图:《〈永乐大典〉卷八〇八所存宋诗话辑考》,《明清研究论丛》总第2辑,2015年,第277—299页。周方高、宋惠聪:《〈全宋文〉拾补十一则——以〈永乐大典〉本〈湖南方志〉为中心》,《信阳师范学院学报(哲社版)》2016年第2期,第131—135页。周方高:《〈全宋文〉增补十二则——以〈永乐大典〉卷5769〈湘阴县古罗志〉为中心》,《井冈山大学学报(社科版)》2017年第1期,第118—123页。

^② 薛瑞兆:《〈永乐大典〉金诗拾遗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6年第5期,第35—40页。李军:《现存〈永乐大典〉元人别集佚籍考六则》,《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》总第2辑,2013年,第1—16页。

^③ 赵维国:《〈永乐大典〉所存宋人刘斧小说集佚文辑考》,《文献》2001年第2期,第89—103页;范子焯:《〈永乐大典〉残卷中的〈世说新语〉佚文》,《文史》2003年总第63辑,第46—53页。袁世硕:《〈永乐大典〉平话探佚》,《敝帚集》,山东大学出版社,2009年,第154—160页。

^④ 包括:《〈永乐大典〉徽州方志研究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3年;《〈永乐大典〉安徽江北方志研究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,2015年;《〈永乐大典〉安徽江南方志研究》,安徽

木兰文化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周方高《〈永乐大典〉本南宋至明初湖南佚志辑校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）均系或含方志辑佚内容。黄燕生《〈永乐大典〉征引方志考述》（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2年第3期，第74—82页）对时存《大典》（797卷）中检得宋、元、明初方志780种约5400条之内容加以系统梳理与介绍，并总结了《大典》收录历代方志的规则与特点，颇具参考价值；其《〈永乐大典〉地图考录》（《文献》1988年第4期，第145—164页）逐次编录考订《大典》所存一百五十二幅方志地图及两幅楚、燕历史地图，亦颇见功力。王继宗《〈永乐大典〉十九卷内容之失而复得——[洪武]〈常州府志〉来源考》（《文献》2014年第3期，第65—77页）经过文献比对与精密计算行格，考证上图藏清嘉庆抄本洪武《常州府志》十九卷即《大典》已佚卷6400—6418“常州府一至十九”之抄本，其深入体察《大典》体例，复原抄本原貌并用以确证此类具有“隐蔽性”《大典》原文之法，颇具启发性。

分类资料辑本方面，涉及医药、小学等领域。萧源、张守知等辑《永乐大典医药集》（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86年）将时存795卷《大典》中医药文献资料按《大典》韵目、卷次排列，辑成一书。王希哲、关祥祖《〈永乐大典〉医药趣闻》（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94年）对《大典》中医药类“趣闻”、故事原文加以注释、翻译。张雪丹、张如青等的系列文章也对《大典》中的医药文献做了更为细致的梳理与介绍。翁敏修《〈永乐大典〉所引小学书钩沉》（万卷楼出版社，2015年。2016年增补）、丁治民《〈永乐大典〉小学书辑佚与研究》（商务印书馆，2015年）均从现存《大典》残卷中辑得（或补充）唐、宋、元、明语言文字学书籍多种。民国时即已单行出版的“永乐大典戏文三种”（《张协状元》《小孙屠》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）经钱南扬校注，于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，成为戏曲研究的重要文献与研究热点，相关研究论文达到数百篇（尤以《张协状元》为著），对该书订补、商榷乃至考订递藏之作，亦有多篇，足见《大典》辑佚工作的重要意义。

《大典》辑佚的进展，今日只能依赖于新卷次的再发现。如国家图书馆2013年正式入藏的湖字册卷2272—2274公布后，赵昱即先后发表5篇论文，从不同角度加以辑佚^①。其次，前人辗转抄录而未被重视的《大典》内容，如清末翰林侍读学士文廷式曾于翰林院借读《大典》300余册，其笔记《纯常子枝语》《知过轩随录》中保留了大量记录，也引起学者的关注^②。

此外，“《大典》辑佚”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本身也是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。史广超《〈永

大学出版社，2019年。

^① 《〈永乐大典〉引据唐人诗集论析——以卷二二七四所见张说、储光羲、李贺诗为例》，《中国诗学》总第26辑，2019年，第5—20页；《〈永乐大典〉（卷2272—2274）新见宋元佚文辑存》，《国学季刊》总第9期，2018年，第128—133页；《〈全元诗〉辑补——以新发现〈永乐大典〉（卷2272—2274）中的元人佚诗为中心》，《长江学术》2019年第1期，第69—75页；《新见〈永乐大典〉（卷二二七二至二二七四）中的宋佚诗辑存》，《版本目录学研究》总第10辑，2019年，第3—33页；《〈永乐大典〉所见明人佚集二种》，《天一阁文丛》总第16辑，2019年，第127—136页；《〈永乐大典〉（卷二二七二—二二七四）新见宋元词佚作辑存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总第21辑，2019年，第164—169页。

^② 李伟国：《〈永乐大典〉卷的宝贵资料——读〈纯常子枝语〉札记》，《文献》1983年第3期，第92—95页；史广超：《〈纯常子枝语〉所云〈知过轩随录〉考》，《兰州学刊》2005年第3期，第257—260页。

乐大典》辑佚述稿》（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）在其博论《〈永乐大典〉辑佚研究》上修订而成，该书以四库馆《永乐大典》辑佚为中心，上溯明代张四维与清前期全祖望，下及全唐文馆时徐松等的辑佚，对四库开馆时《大典》存卷数、辑佚人员、辑佚程序、辑本数量、辑佚得失等问题深入探讨。书末还附有四库馆前、四库馆、全唐文馆、唐文馆后《大典》辑佚书目数种，颇具资料价值。

有意思的是，因为“《大典》辑佚”是编修《四库全书》的先声，是《永乐大典》与《四库全书》两部旷世巨著的重要交集，其最著之成就亦出于四库馆臣，故四库馆的《大典》辑佚成为《大典》辑佚史的核心话题。曹书杰《〈四库全书〉中“大典”本辑目》（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1986年第3期，第133—140页）统计四库辑自《大典》之书合计516种，其中著录388种、存目128种，为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精确探讨奠定了基础。李晓明《〈四库全书〉宋别集类的〈永乐大典〉辑佚书》（《文献》2001年第2期，第184—192页）对比文津阁与文渊阁本中宋别集类自《大典》辑出之书128种彼此之异同，发现正文相同、附加内容（如考证、谕旨）不同者14种，内容存在差异者51种，认为应重视文津阁本中《大典》本“溢出部分”之挖掘。张升《四库馆签〈永乐大典〉辑佚书考》（《文献》2004年第1期，第17—30页）考察抄本《永乐大典书目（残本）》，以其为当时馆臣签出拟辑《大典》佚书目之汇编，可据以考察《大典》签出佚书数量（原达千余种，但仅有其半入选《四库》及存目），修正对馆臣辑书工作之批评（如辑佚范围实际较广、工作效率低情有可原），认识《四库》大典本提要之错误（纂修官多据辑佚底本撰写提要，录入《总目》时有些未经修改）；还对馆臣签佚书单情形加以考辨。张升《从〈春秋会义〉看〈四库〉大典本辑佚》（《图书与情报》2005年第5期，第102—105页）指出《大典》本初辑底本均注明每条佚文在《大典》中之出处；《大典》纂修与分校官所作辑佚工作颇为复杂，用功颇勤；《大典》纂修与分校官在进行校订时尽可能多地参考它书进行校勘、补辑；四库馆办理之大典本有不少经人录副而流播于外；抄成之《四库》大典本定本也有可能未被收入《四库》，这些细节对深入认识馆臣辑佚工作有参考价值。赵灿鹏《宋人曹彦约〈昌谷集〉中杨简诗作的羸入问题辨析——兼论〈永乐大典〉征引佚书的误辑问题》（《书目季刊》第41卷第3期，2007年，第53—66页）揭示四库馆臣自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宋人曹彦约《昌谷集》二十二卷，但羸入时人杨简诗作二十四篇，且新编《全宋诗》沿误未改。文章除探讨真伪及探究原因外，指出《大典》征引诗文出处多有讹脱，后人据以辑佚时尤须注意。罗琳《〈四库全书总目〉“著录”“永乐大典本”考——〈四库提要著录丛书〉编纂札记之二》（《版本目录学研究》总第1辑，2009年，第278—286页）则对比《四库总目提要》与文渊、文津、文溯阁提要“《大典》本”记载之差异，论证馆臣撰写提要及复核时的随意与疏漏。王照年《〈永乐大典〉现存〈麟台故事〉材料的勘正》（《漳州师范学院学报》2011年第1期，第41—44页）考证《大典》原文与四库馆臣辑出之《麟台故事》之间差异较大，辑本经过馆臣再加工。罗琳、杨华《〈四库全书总目〉“永乐大典本”与〈文渊阁四库全书〉考》（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2年第3期，第94—97页）则将四库馆臣辑自《大典》的386种书分为全部辑佚自《大典》（40%）、全部辑佚自《大典》且内容多于存世典籍（20%）、《大典》辑佚本与存世典籍互补（30%）、误认典籍亡而辑佚《大典》（10%）四类，重新评价其得失。史广超《〈四库全书〉大典本宋集卷

数异变探微》（《图书馆杂志》2020年第2期，第117—121页）从四库馆稿本、阁本、武英殿聚珍本、传抄本等“中间本”及提要等方面，考察《大典》所收宋集卷数变动之痕迹。指出这些异变由据御旨删去青词等体、为与提要所言卷数一致而删去某些卷次、相同内容重编等诸多因素所致。卷数异变揭示了早期版本有独特价值、七阁本所据并非全为同一底本等规律，也部分修正了学人对四库馆臣辑佚工作的负面评价。

（三）《大典》文献对存世文献的校勘与比较研究

《大典》既为文献之渊海，所据版本又多为宋元善本，故辑佚之外，用以校勘存世文献，亦是其主要价值之一，二者常相伴而行。早在四库馆时代，馆臣即据《大典》校勘古籍（如《春秋繁露》）^①。此后凡有新发现《大典》面世，文献的辑佚与校勘即随之而来；借助《大典》文献校勘存世文献，也成为一种学术常识，故本节仅讨论其荦荦大者。

以《大典》文字与存世文献比勘而反推《大典》原据之版本，是这一时期《大典》校勘研究的一个新的动向。瞿林江《新见〈永乐大典〉残卷引“礼记类”诸书及版本考》（《文献》2018年第1期，第78—86页）介绍美国亨廷顿图书馆所藏《大典》，并对其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小注征引历代《礼记》相关著作13种加以考证，断定其主体传抄自宋十行本《礼记注疏》，然因抄写质量不高，校勘价值受到影响。冯先思《〈永乐大典〉引〈玉篇〉版本考》（《文献语言学》总第11期，2018年，第43—54页）考证《大典》所引《玉篇》在大量参考元刊增训本基础上形成新文本，而非《四库提要》所云出自唐上元年间孙强增字本。黄觉弘《〈永乐大典〉残卷所见杜谔〈春秋会义〉原文校说》（《东北师大学报》2019年1月8日“中国知网”网络首发）以《大典》存宋人杜谔《春秋会义》15则与传世诸本对勘，校说今传诸本之异同。杜以恒《〈永乐大典〉引〈周易〉经注疏释文底本初探》（《周易研究》2021年第1期，第77—87页）通过全面辑校《大典》残卷所引《周易》经、注、疏、释文，提出两种底本系统的可能及其依据。

在校勘文字的过程中，进而将《大典》存卷与同名乃至同主题文献做内容上的比较研究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。当然，这类论著数量相对较少，且不易检录，所见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：梁太济《〈永乐大典〉残存《长编》宋神宗朝记事补校》（《文献》1994年第2期，第253—266页）因点校本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未据《大典》残卷取校宋神宗朝事，故补校之，成《校记》42则。邓广铭《〈永乐大典〉所载〈元一统志·陈亮传〉考释》（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96年第2期，第91—97页）以《大典》所载陈亮事迹与其他史籍加以对比，考订其异同是非。王宇《陈亮“六达帝廷”说试考——兼论〈永乐大典〉所载〈元一统志陈亮传〉的真实性》（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17年第10期，第141—146页）则对《陈亮传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。黄宽重《〈永乐大典〉中〈三朝北盟会编〉史料及其相关问题》（《文献》2003年第2期，第98—112页）辑录《大典》存《会编》文字31则，复取6种《会编》版本与《大典》比勘，肯定《大典》很高的史料与参照利用价值。毛华松《西湖文化的演进历程及其历史意义——〈永乐大典·六模湖〉中的西湖文献统计分析》（《中

^① 此项工作仍有推进空间。如吴政上《〈永乐大典〉校补〈四库全书〉本的价值——以宋周必大〈辛巳亲征录〉为例》（《论文集》，第34—60页）以宋周必大《亲征录》为例，逐句比较《大典》本、两种《四库》本（文渊阁、抄文溯阁）以及清道咸间欧阳棨刊本之优劣得失。认为《四库》本讳改、脱漏较多，《大典》可作为校勘之善本。

国园林》2014年第11期,第117—120页)结合《大典》与其他文献所载西湖史料,考察西湖文化演进历程及其历史意义。郑守治《〈武林旧事〉所见元宵“舞队”名目校订、考释——以〈永乐大典〉本为中心》(《韩山师范学院学报》2016年第5期,第64—69页)以《大典》所载《旧事》所见元宵“舞队”名目与存世诸本相互校订,并考释相关词语含义。戴建国《〈永乐大典〉本宋〈吏部条法〉考述》(《朱瑞熙教授八秩寿庆文集》,中国商务出版社,2017年,第288—301页)讨论了《吏部条法》与《吏部条法总类》之关系,认为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修纂而成。董岑仕《〈永乐大典〉之〈崇文总目〉、〈四库阙书〉考——兼论〈永乐大典〉中四十二卷书目汇编》(《古典文献研究》2018年第2期,第173—203页)对《大典》中所收北宋《崇文总目》及徐松辑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》之源流、面貌,《大典》对应卷帙如何进行书目汇编,徐松辑佚之评价等提出看法。杜治伟《〈永乐大典〉所引〈西游记〉试探》(《明清小说研究》2020年第1期,第76—91页)讨论《大典》本及《朴通事谚解》本《西游记》之异同,认为“大典”本在“谚解”本基础上有新发展,在整体架构和历难模式上进一步向百回本趋同,成为其最直接之祖本。

此外,随着研究的深入,学者们逐渐意识到,《大典》虽保留了宋元善本的“善处”,但毕竟成于众手,且格于体例与参与者的水平与态度差异,成书过程中时有对原著题名的简省及内容的分合与删改,容易造成辑佚与校勘时的误解与脱漏,亦是不容忽视与回避的问题。王云海《〈永乐大典〉本〈宋会要〉增入书籍考》(《文献》1980年第3期,第116—142页),陈智超《〈宋会要辑稿〉的前世现世和来世》(《历史研究》1984年第4期,第182—192页)、《从〈宋会要辑稿〉出现明代地名看〈永乐大典〉对所收书的修改》(《史学月刊》1987年第5期,第33—35页),杨玉锋《〈全宋诗〉补遗不能迷信〈永乐大典〉》(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》2020年第3期,第92—94页)均曾对这一现象加以讨论。

四、未来研究的展望

伴随着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的整体进步和各类文献使用上的日益便捷,近年来的《大典》研究,趋于精密,泛泛而谈的大路货已难觅其踪。但另一方面,因为新的存卷较少出现,三大研究主题均显露出某种迟滞。学术界普遍的疑虑是:《大典》存卷如此有限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研究如何进一步向前推进?

目前,就推进《大典》研究而言,笔者以为较为实际的做法,有如下数端:

(一) 继续致力于访查存世《大典》

“久阅沧桑惜弗全”(乾隆诗句)。毋庸讳言,《大典》存卷较少,是巨大的遗憾。据史料记载,数千册《大典》“副本”因翰林院官员监守自盗,陆续于清代中后期散入官民之家。但这一时期,人们已有较高的收藏意识(存世宋元善本的递藏脉络,从清代中期起往往非常清晰),《大典》浓厚的皇家气息,巨大的开本,在民国以前,都限制了其自由流通,进而降低了流通中的损失概率,何以竟如泥牛入海,一去无消息?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除了仍可能存世的“正本”之外,继续致力于访查存世副本《大典》,是一项应长期坚持的工作。近年来新出《大典》极高的拍卖价格(如国内藏家于2020年在法国以含佣812.8万欧元拍得两册),或亦有助于吸引秘藏在海内外而不为人知的《大典》存卷现世。

（二）全面梳理《大典》史料

《大典》诞生以来已逾 600 年，饱经沧桑。近年来各类相关文献不断发布、出版，但迄今并无系统性的收集与总结。建议从档案、文集、方志、日记、信札、报刊等文献中，全面收集《大典》自明初编纂，明中叶重抄，清中叶辑佚，晚清民国收藏、散佚、外流，直至当代的回归、修复、重印等中外史料，为进一步推进《大典》的编纂与流传研究以及发现新的《大典》存卷线索提供文献支撑。

（三）编辑《大典》丛书

《大典》包罗万象，但除了医学、小学类外，较少分类辑录其资料。建议分类辑录现存《大典》中的地理、出版、女性、艺术、营造、物质文化等等类别的史料，成一“《永乐大典》丛书”，以便不同领域的学者利用^①。

（四）充分利用《大典》数据库、E 考据和数字人文技术，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范式

目前，爱如生的“类书库”、雕龙古籍数据库和国图出版社均有《大典》全文数据库，使《大典》的综合利用更加便捷；也有学者开始尝试用编程手段进行《大典》自动辑佚等尝试。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和理念，在新的高度去驱遣、运用文献来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，是留给《大典》研究者们的新课题。

此外，利用《大典》存卷、《大典》目录等史料和前人辑佚所得，以较低的成本对《大典》进行某种程度的电子文献复原，似亦可探索而为。这种“逆向工程”，不同于圆明园的重修，并不会对原书造成什么危害，恢复《大典》部分原貌之余，或许可以使我们对其编纂过程有更透彻的理解^②。

《永乐大典》成书已逾六百年，从不同角度对其加以研究，也已过百年。2021 年 5 月 31 日，“《永乐大典》研究中心”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挂牌成立。我们衷心希望，中心的成立，能够会同海内外《大典》收藏机构与研究学者，使《大典》的保护、研究与再发现，在新的起点上，迈向更高的水平！

^① 黄永年《从〈永乐大典〉的性质谈如何利用》（《学苑与书林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178 页）、郝艳华《〈永乐大典〉史论——六百年来的流传、整理与研究》（第 287 页）均提出过类似建议。

^② 张舰戈、张升《论〈永乐大典〉之复原》（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》2016 年第 2 期，第 223—238 页）一文对此有详细构想，可参看。